

鄭振鐸年譜

陈福康 著



上册

晋
知
聲
PDG

山西出版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序 言

郑尔康

记得早在 1980 年代初,福康同志还在上海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就给我来信,说想为我父亲郑振铎先生撰写一部年谱。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这也正是我多年想做的一项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种种困难,自己一直没有着手进行。而福康年富力强,聪明勤奋,潜心于文史研究,特别是对郑振铎的著作及生平已经下了极大的功夫,尽可能地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很多地方可以说是我所自愧不如的。因此,由福康来撰写一部资料丰富、确凿详尽的《郑振铎年谱》,我和当时还健在的家母,是十分信得过的。于是,福康就埋头苦干起来了。他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再次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李何林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负笈京城又攻读了三三年,期间也一直在继续为这部年谱搜集资料、调查访问和推敲撰写。终于,在 1988 年纪念郑振铎诞生九十周年和牺牲三十周年时,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即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五六十万字的《郑振铎年谱》。

当时我应福康之请,为该书写过一篇序,其中有这样一些感慨:

“1958 年,父亲在万里长空中,光辉而壮丽地完成了他生命之歌中的最后一个乐章,像‘火中凤凰’一般地飞向了无垠的宇宙。对于他的一生,作为儿子的我,似乎不宜过多评说;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就在父亲为国捐躯的那年,他正遭受着规模很大的、极不公正的‘批判’。当然,他那时是很痛苦的,他当时在书斋中踱步苦思的情景给我留下

极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然而,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怀着一颗忠诚的心,刚开罢‘批判’会后,就毅然领受了率团出国的使命(这说明党是信任他的),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登上了征途。也只是由于他在异国他乡的壮烈牺牲,这场‘批判’才不了了之。然而,自那以后,他的名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很少出现在有关文学史、学术史等等著作、文章中。很多青年人,甚至于一些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对于郑振铎其人以及他一生对于文学事业的贡献几乎一无所知。这倒还不算什么;然而在某些虽然提到了他的文章里,却对他戴着有色眼镜加以评论,对这些评论,笔者和福康同志是实在不能苟同的……

“有感于此,福康同志认为,要改变世人的某些偏见,只有让已被湮没了的历史,重新站出来说话。也正是有鉴于此,福康同志才下决心编写这部年谱的。先父挚友叶圣陶先生说过:‘我常常这样想,应该有人发个愿心,为振铎兄写一部传记,这对帮助人们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大有好处。我还认为振铎兄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读者受到感染了。’”(《郑振铎选集》序))记得福康同志曾跟我讲起过他自己正有这样一个‘愿心’。我想,他编写的这一年谱正是他将来要写的传记的基础吧。我相信这部毫无虚夸、内容翔实的年谱的问世,对于检验过去一些关于郑振铎的议论之是否确切,是可以得到帮助的。同时,这部书也一定‘对帮助人们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大有好处’。因此,它虽然不是传记,但基本上是符合了叶圣陶等前辈的愿望的。”

应该说,我在二十年前写到的那些对郑振铎的偏见和忽视的状况,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而这其中,就有着福康突出的劳绩和贡献。2000年,北京大学老教授严家炎先生在为一位香港学者关于郑振铎文学思想研究的书所写的序文中,就这样指出:“可惜长时期里,我们对郑振铎的研究比较少。直到[一九]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才有陈福康先生等为此倾注大量心血,作出显著成绩。”我完全同意严先生讲的这句话。

福康除了撰著这部年谱以外，还发表了很多有关郑振铎研究的论文，而且后来又出版了《郑振铎论》（1991，商务印书馆）和《郑振铎传》（1994，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书。其《郑振铎传》还荣获了全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奖和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有一位日本学者尾崎文昭教授在一篇论文中甚至说：“在中国，郑振铎研究几乎是陈福康一个人的舞台。”但我知道，他后来那两部书的撰著，都是在《郑振铎年谱》打好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福康这样子做学问，我是非常佩服的。我在当年写的序中就认为：“他的这种治学的严谨态度与方法，正是先父生前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父亲写东西，从不凭虚立论，而是以史实根据为第一，力求客观与实在。因此，他有的论文尽管‘下笔浑如不系舟’（茅盾《挽郑振铎》），但至少给后人研究和继承文学遗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比某些只有‘见识’而无‘知识’，‘宏’则‘宏’矣、‘观’却‘观’不到什么的‘宏观论文’要略胜一筹吧。”

我当时还写道：“这是一部具有史料和学术价值的书。在编写过程中，笔者与福康同志多有过往。他确实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常常冒了严寒酷暑，风霜雨雪，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踏踏实实地查阅了不计其数的当年的出版物以及书信、日记、档案等；访问了许多文坛前辈。靠着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排列、分析，大到一部专著，小至一则记事，他都不轻易放过，就这样，他发掘出了不少人所未知的材料和佚文、佚事，有些是连笔者都不知、也从未听先母提起过的。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本书编写者对先父生平中的不少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如，对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的缘起与是非，对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何以未加入左联，对于先父是否加入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到了一些先父老友及前辈学者的关注和好评。”该年谱出版后，我就曾在叶圣陶、夏衍、李一氓、启功、叶至善等先生那里，听到过对此书的夸奖。不仅国内有多篇评论，而且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教授、香港学者黄俊东编审、内地学者陈子善教授等先生，还

在海外发表过专门的书评。可以说,初版的那本年谱已经是一部名著了。只是,当时仅印二千多部,这么多年来不断有朋友向我和福康要书,但绝版已久,也没法满足他们。我在网上还看到过,有人把该书书价涨到一百多元呢。好多年前,我就想帮福康联系再版,但他却说还想补充修订一下。

近二十年来,与先父有关的史料新发现了很多,其中不少正是由福康发掘、考证、整理出来的。每当他发现了什么线索,看到了什么材料,总是极其兴奋地马上告诉我。我满以为,他既有这么多年的积累,那么年谱补订起来一定不那么吃力。谁料想他正式动手修订,埋头一搞又是一二年,据他说一点也不轻松。我想,那肯定是因为他做学问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如今,他的修订稿完成了,别的不说,仅从字数看,就大概是初版的两倍。我听福康说过,撰写年谱和写别的东西不一样,是不需要虚构的,不需要形象描写、心理描写之类,也不需要过多的作者自己的分析、议论。它排斥“水货”,要的是实打实的与谱主有关的史料。因此,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要补充,是不可能增加这么多篇幅的。而且,福康一如既往,并没有像有的年谱那样大段大段、甚至成篇成篇地抄录谱主的文章和有关资料,也没有像很多年谱那样在每一年甚至每一月的开头都写上许多当时国内外的大事记。(《郑振铎年谱》除了在谱主童年,大概因为实在缺少生平史料,才附上了一点有关的背景材料。)福康很注重直接引用第一手珍贵资料(如日记、书信、档案等),但也只是摘录其主要内容。我还听福康说过,他不满意于现在有的作家年谱写得就好像只是谱主的写作年表,似乎谱主除了写作以外就什么也不干。他认为年谱要尽可能全面地记载谱主的行事和言论,对作家也是一样,虽然写作是作家的主要工作,但并不是其全部人生。他说,他写的年谱就要注重“纪事”。他又说,梁任公据章实斋语而昌言:“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而年谱之效用,时极宏大。”年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史学著作,要通过一个人看到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特别像郑振铎这样的交游极广,阅

历极富,充满活力,甚至有点传奇色彩的谱主,一生做过的工作、联系的人物等等非常之多,在年谱中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为此,福康看了大量的与先父有关的人士的书,包括未出版的“书”如私人日记等等。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日记。先父的日记,现已由福康整理后出版了,这次年谱修订中当然作了充分的利用。此外,这部年谱引用的他人的日记多达三十余种,不仅有鲁迅、周作人、胡适、叶圣陶这样大家知道的有名的日记,还有一些如杨昌济、赵南公、蔡元培、王伯祥、刘承幹、陈君葆、季羨林、赵家璧、贾进者、胡朴安、张珩、卢前、朱偰、沙孟海、常任侠、吴祖光、柯灵、史久芸等人的日记,大概是很少为人所知的吧。因此,内行的读者一定会感到,这样的年谱是比较少见、非常实用的。

这部修订本年谱还有很多特色可说,我也不多写了。总之,初版本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而现在,作者的修订本又做到这样子,我实在感到又惊又敬!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张继红总编的大力支持下,这部修订本《郑振铎年谱》可望在二〇〇七年问世。明年,就要迎来父亲诞辰一百十周年和牺牲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了,因此,这部年谱的出版是一桩十分及时的有重要意义的事,我非常地高兴!我想,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谢谢年谱作者和山西古籍出版社的同志们!

二〇〇七年五月一日修改于玄览堂



目 录

(上册)

序言 / 郑尔康	1
----------------	---

年谱本文

一八九八年 一岁	1
一八九九~一九〇四年 二岁~七岁	3
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 八~九岁	4
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 十~十二岁	5
一九一〇年 十三岁	6
一九一一年 十四岁	6
一九一二年 十五岁	8

一九一三年	十六岁	9
一九一四年	十七岁	9
一九一五年	十八岁	10
一九一六年	十九岁	11
一九一七年	二十岁	12
一九一八年	二十一岁	14
一九一九年	二十二岁	17
一九二〇年	二十三岁	25
一九二一年	二十四岁	44
一九二二年	二十五岁	62
一九二三年	二十六岁	83
一九二四年	二十七岁	98
一九二五年	二十八岁	112
一九二六年	二十九岁	132
一九二七年	三十岁	152
一九二八年	三十一岁	186
一九二九年	三十二岁	199
一九三〇年	三十三岁	212
一九三一年	三十四岁	221
一九三二年	三十五岁	235
一九三三年	三十六岁	244
一九三四年	三十七岁	259
一九三五年	三十八岁	287
一九三六年	三十九岁	308
一九三七年	四十岁	322
一九三八年	四十一岁	337
一九三九年	四十二岁	350
一九四〇年	四十三岁	359
一九四一年	四十四岁	390

一九四二年	四十五岁	417
一九四三年	四十六岁	425
一九四四年	四十七岁	463
一九四五年	四十八岁	488
一九四六年	四十九岁	519

(下册)

一九四七年	五十岁	555
一九四八年	五十一岁	625
一九四九年	五十二岁	673
一九五〇年	五十三岁	715
一九五一年	五十四岁	743
一九五二年	五十五岁	767
一九五三年	五十六岁	789
一九五四年	五十七岁	811
一九五五年	五十八岁	833
一九五六年	五十九岁	857
一九五七年	六十岁	907
一九五八年	六十一岁	995

附录一

郑振铎笔名别名一览	1051
-----------	------

附录二

郑振铎著译编校书目	1060
-----------	------

附录三

郑振铎研究资料选目	1140
-----------	------

后 记	1160
-----	------

一八九八年 一岁

(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十二月十九日(阴历十一月初七)

郑振铎出生于浙江省温处道永嘉县(今温州市)。诞生地是乘凉桥一间名叫“炮丁”的旧屋子内(据叶大兵查访)。

郑振铎,字警民(据 1913 年《浙江第十中学校同学录》和 1920 年《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毕业纪念册》),又字铎民(据 1920 年 1 月《永嘉新学会会员录》)。因幼时大人为他“算命”,“五行缺木”,故小名木官。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统治区曾用化名陈敬夫(一说用陈思训)。常用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由名字与常用笔名衍化的笔名有:振铎、铎、郑西谛、西、谛、C.、源新、源、新、谷远、谷、远等;还曾用过笔名:慕之(《小说月报》)、S.C.(《儿童世界》)、子汶(《小说月报》)、Y.K.(《鉴赏周刊》)、文基(《小说月报》)、西源(《文学周报》)、宾芬(《小说月报》)、何谦(《文学》)、禾忠(《政协会刊》)、云纹(《政协会刊》)等;抗日战争时期用于影印出版古籍、署于藏书题跋、署于致重庆有关当局密信的化名有:玄览堂、玄览居士、幽芳居士、纫秋居士、犀谛,以及幽芳阁主、幼舫、友荒、纫秋、纫秋山馆主人、纫秋主人、纫秋馆主等。

郑振铎祖籍为福建省长乐县(今改为市)首占乡。祖父郑承晟,字允屏,号绍平,咸丰己未年正月初七(1859 年 2 月 9 日)生,约 1911 年卒。祖父“年轻时由福州跟随在温州当道台的表亲到温州当幕友,在道台衙门内做抄写工作;后来被委派为铜山岛海防小官”(据郑振铎大妹郑绮绣回忆)。为“浙江试用从九品”(据《郑兆祺家谱》)。祖母陈氏,咸丰乙卯年十二月廿二日(1856 年 1 月 29 日)生,约 1943 年 3

月卒。郑家迁温州大约在 1895 年。

祖父有三男三女。长子即郑振铎的父亲郑庆咸,生于光绪辛巳年四月十七日(1881 年 5 月 14 日),约卒于 1909 年;次子郑庆晋,生于光绪壬午年七月十五日(1882 年 8 月 28 日),卒年不详,早逝;三子郑庆豫,字莲蕃,约生于 1886 年,1908 年京师译学馆毕业后,去西班牙留学,归国后在北京外交部任签事,1944 年 4 月卒。三个女儿今皆不知名字,长女后嫁福州陈家(据说陈父曾在云南大理府任知府);二女后嫁福州李家;三女出世后因家境穷困被迫送给人家做养女。

郑振铎父亲郑庆咸和母亲郭宝娟(约 1880 ~ 1968)“自幼由双方母亲指腹为婚定亲”。郭氏“十六岁时因母亲(郭家)去世,而夫家(郑家)全家即将由福州去温州,随出嫁跟随丈夫一家到温州定居”(据郑绮绣回忆)。

郑振铎为长子,后有大妹郑绮绣(1901 ~ 1991)、二妹郑文英(1906 ~ 2000),另有一小弟出生数天即夭亡。

本年 5 月 19 日,温州城区发生群众罢市,反对米价暴涨和征收新税,进而捣毁衙署。总镇衙门开枪,死伤群众数十人。

1 月,康有为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3 月 26 日,康有为发动“公车”百余人上书。4 月,康有为、徐致清、杨深秀等人先后上疏要求“明定国是”、变法维新。6 月 11 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依附于皇帝而发动的一次政治改良运动,史称“戊戌变法”。但由于遭到顽固派的疯狂反对,仅历 103 天便惨遭失败。在此期间,温州也出现了陈虬、宋恕、陈介石(当时被称为“温州三杰”,又称“东瓯三先生”)以及孙诒让、黄绍箕等改良派人士。陈虬曾参加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并在温州瑞安组织“求志社”,在温州创办“利济医院”等;宋恕是许寿裳的老师,章太炎的好友,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交往甚密;陈介石是马叙伦的老师,交谊深厚。

一八九九~一九〇四年 二岁~七岁

(光绪二十五~三十年 己亥~甲辰)

在温州度过幼年时期。在三岁那年,辛丑年除夕(1901年2月18日),大妹郑绮绣生。此时,家庭经济靠祖父做小官吏的收入,没有固定的房地财产,祖父常常一人喝酒。郑振铎后回忆说,“回想起来,似乎他那时是非常的高兴,他是陶醉着,为快乐的雾所围着,似乎他的沉重的忧郁都从心上移开了”,“在孙男与孙女中,他特别的喜欢我”。(《宴之趣》)

1899年3月,山东义和团朱红灯部起义。年底,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各州县。1900年春,义和团主力由山东向直隶转移,随后进入京、津。6月,运动达到最高潮。8月中旬,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同月,沙俄派遣十余万侵略军入侵我国东北。义和团起义农民遭到血腥镇压。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俄、美、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公使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出卖京津周围的军事控制权,在北京设立使馆区等,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帝国主义的控制与掠夺之下。温州早在1876年英帝国主义威逼清政府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即被辟为所谓通商口岸,并作为外国领事官驻扎之处。外国传教士等在温州的活动亦一直很活跃。但温州人民从没停止过对侵略、掠夺和压迫的反抗与斗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温州地区也有农民起义响应,他们不称义和团而称神拳会。在北京义和团遭到失败后,温州瑞安地区的神拳会还继续坚持斗争若干时。

1899年冬,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章太炎所著《馗书》木刻本

刊行,后于1902年又在日本东京出版其修订本。1903年2月,留日爱国青年在东京创刊《浙江潮》月刊,随后《湖北学生界》、《江苏》、《汉声》等反清革命刊物相继创办。1903年5月,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的邹容的政论《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同年,署名“黄帝子孙之多数人”的《黄帝魂》(张继编)出版,收有关反清革命的文章29篇,后于1911年重刊,增至44篇。1904年,陈天华所作通俗政治读物《猛回头》、《警世钟》在上海发行。随后,温州乐清县虹桥人陈耐辛亦作《新山歌》,内容与《猛回头》、《警世钟》相类。这些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读物不久即对少年郑振铎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少年时候,便以读《黄帝魂》、《浙江潮》一类的书为乐。‘雪夜读禁书’,公认为‘人生一乐’。”(《文化正被扼杀着》)

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 八~九岁

(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乙巳~丙午)

约1905年,父亲去扬州当幕友,郑振铎随之去扬州生活。(1906年5月14日,二妹郑文英出生于扬州。)不久,父亲因受刺激得病,回温州疗养无效逝世。郑振铎自述:“余幼客扬州二载,尝游法海寺。”(《〈扬州东园题跋〉题跋》)据郑绮绣回忆,父亲在扬州当幕僚时,“一天在衙门后花园见到知县的如夫人[按,即小妾],看她长相很像自己的妹妹,后经多方打听,原来即是给人家当养女的那个妹妹。当时思想上受到严重刺激,认为是奇耻大辱,当即神经错乱,由家人接回温州治疗无效,不久即去世。”

1905年8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11月,同盟会机

关报《民报》创刊于东京,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主”的三民主义纲领。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领导下,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

1906年3月,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回到东京,弃医从文,专门从事文学活动。4月,《民报》发行号外《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有计划地对改良派展开大规模论战,国内外二十余种报刊投入了这场有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辩论。

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 十~十二岁

(光绪三十三~宣统元年 丁未~己酉)

约1907年,回到温州。父亲病故后,家庭生活渐趋贫困。祖父常借酒浇愁,又过几年亦抑郁而亡。父亲病故前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小弟弟。郑振铎后写诗回忆说:“虽然我们只见了五六面,/但是这初生婴孩的最后的哑而不扬的哭声,/至今还使我负着悲哀的重担。”(《死了的小弟弟》)约此时,进小学读书。郑振铎后回忆说:“国文教员拖长了声音,板正了脸孔,教我读《古文观止》。我至今还恨这部无聊的选本!”(《记黄小泉先生》)

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驱赶出境,旋即领导国内会党多次举行武装起义,虽每次均遭失败,但革命斗志不减。1907、1908年,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等文,介绍了当时国外进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归国。11月,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近代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一九一〇年 十三岁

(宣统二年 庚戌)

约本年,跟从黄小泉先生念书,与其子黄炎甫为同学。郑振铎后来回忆说:“小泉先生教我念《左传》,他用的是新的方法,我却很感到趣味。”“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记黄小泉先生》)

本年,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清斗争增多,突出的有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同时,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也更为频繁。

7月,《小说月报》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恽铁樵主编,1918年改由王蕴章主编。1920年前,该刊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1921年起由沈雁冰主编(郑振铎在后面大力支持),内容上全面革新,实际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1923年起至1931年底终刊为止,由郑振铎主编。

一九一一年 十四岁

(宣统三年 辛亥)

约此年前后,开始学习创作。郑振铎后来回忆说:“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

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中国文学论集〉序》）

约本年春，入温州府官立中等农业学堂读书。该学堂设在道后关帝庙后进，原为温处道道尹董兆蓉（绍甫）在 1902 年后创办的蚕桑学堂，此时在道尹郭则沅主持下改名中等农业学堂，聘吕文起为校董，委施震泽为监督，潘宣丞为监学，扩大规模，招收新生。预科第一年级教学内容有修身、文学、历史、地理、经学、英文、算术、物理、化学、植物、图画、体操等十二科，与普通中学科目相似，育蚕另设技术科，由蔡冠群担任，“但很少亲授农业实际生产知识，似难满足学生需求。教师又采用注入式教学方法，不切合客观愿望。当时学生反映‘学了一年，没有获得显著农业生产知识’，因此部分学生自动转学。如郑振铎转温州中学，陈经转温州师范，包容、夏铨转法政学校。”（冯举千《我所知道的温州蚕桑学堂》）

本年 4 月 27 日，在孙中山领导下，黄兴等发动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72 位烈士合葬于广州市郊黄花岗。5 月 9 日，清政府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旋将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等外国银行，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形成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史称“辛亥革命”。

11 月 4 日，杭州新军起义，当夜通电全省，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7 日，温州各界在道司前的第一师范学校操场，举行了庆祝光复大会，并发表了拥护革命的通电。8 日，温州宣布独立，原防营统领梅占魁被推为温州临时军政分府兼温处警备司令。

一九一二年 十五岁

(民国元年 壬子)

约本年,曾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农民之间。郑振铎自述:“著者童年时,那时已经是在民国初元了——曾有一个时期居住在农民之间。农民们常苦于横征暴赋,叹息于兵戈的扰乱不息。当夏天,夕阳下了山,群星熠熠的明灭于天空,农民们吃过了晚饭,端了木凳,坐在谷场上,嘴里衔着旱烟管,眼望在茫茫无际的天空时,他们便往往若有所思的指点着格外明亮的一颗星道:‘喏喏,皇帝星出来了,听说落在西方呢。真命天子出来,天下便有救了。’”(《玄鸟篇》)

本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4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辛亥革命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破坏下,以妥协告终。

8月底,强台风袭击浙南,温州、处州一带暴雨成灾,海塘被毁,山洪暴发。据统计淹没农田41万亩,摧毁民房34万6千余间,灾民达59万4千余人。

